从怀远街到台儿庄：

昭通实业抗战的微观史

通讯员 夏 吟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昭通古城，这座位于西南边陲的古老城镇，虽未直面战火纷飞的前线，却以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成为抗战大后方坚实的支撑。

热血儿女 踊跃奔赴前线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昭通各族儿女展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爱国情怀，踊跃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据统计，镇雄县参加抗战的将士多达1万余人，而昭通各县（包括今东川区、会泽县在内）抗战期间征兵总数高达5万人。

在这片热土上，涌现出许多令人动容的英雄家族：盐津赵克家族，堂兄弟5人中有4人参军，其中3人战死、1人重伤；昭阳区彭勤家族，兄弟彭天达以及堂表兄弟11人战死台儿庄；昭阳区蒋壁明家族，兄弟战死，姐妹参军……他们前仆后继，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训练基地 孕育抗战精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昭通古城怀远街成了热血与希望的汇聚地——新兵督练分处在此成立。来自今东川、会泽、宣威和昭通各县的抗战新兵纷纷汇集于此，接受集中训练。他们按照不同兵种编组装备，经过3个月的艰苦训练后，穿上军装，奔赴前线。

从1937年至1945年，昭通怀远街训练点始终坚守使命，是云南坚持时间最长、人员规模名列前茅的抗战新兵训练大本营。在此期间，该训练基地不断扩展，从团管区升格为昭宣师管区，累计训练新兵3万多人，为抗日前线输送新生力量。

积谷垦荒 夯实抗战粮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抗战的重要保障。早在1931年，龙云就号召云南人民开展积谷运动。昭通在安恩溥的倡议下积极响应，在各县各乡镇建立积谷仓库，并在昭通城怀远街的江西会馆建成全省最大的积谷仓库，该仓库后由昭通市粮食局一直使用到2000年。

182师在昭通元宝山接受检阅。

为支援抗战、多产粮食，昭通在安恩溥等人的带领下兴修水利，新开垦出5000亩土地。抗战期间，昭通农业喜获丰收，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齐心协力 构筑交通防线

交通是抗战的生命线，昭通人民深知其重要性，积极投身于交通建设中。

在修建抗战机场方面，1938年底，昭通人民齐心协力修建了军用飞机场，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基地。该基地一直使用至20世纪90年代，为培养抗战飞行员、支援空中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更好地训练抗战新兵，昭通整修了北教场，还在元宝山修建了逐日（寓意驱逐日寇）运动场。

在公路建设方面，昭通积极筹划修建公路，人民群众踊跃参与施工。1937年9月，昭通至昆明的公路已基本通车，当昭通抗战将士出征时，大多能乘车前往，这为他们及时奔赴前线争取了宝贵时间。

兴办实业 生产抗战物资

实业救国，是昭通人民对抗战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31年，昭通就成立了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积极开展发电、开矿、碾米、自来水供应等工作。1936年，实业公司旗下的电灯公司开始发电，昭通全城灯火通明，开启了城市现代化的新篇章。

抗战期间，昭通古城成了一个重要的抗战物资生产基地。这里拥有3万多台织布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女性参与织布，50多家缝纫社日夜运转，为抗战将士生产军装和行军被。毛货街则成了皮鞋、皮包、皮带的生产基地，其生产的军用反帮皮鞋深受抗战将士喜爱。铁匠街更是热闹非凡，作为军用兵器的生产基地，刺刀、军用小刀、大刀等武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被运往前线，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此外，昭通还生产火柴、肥皂等生活物资，这些产品也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踊跃捐资 汇聚抗战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昭通、镇雄等各县纷纷成立抗日支前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战宣传，为全国抗战提供舆论支持。随后，各县广泛开展“七七献金”活动。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在昆明带头捐资，极大地激发了昭通人民的捐资热情。一笔笔捐款汇聚成支援抗战的强大力量，彰显了昭通人民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决心。

青春热血 燃起救亡烽火

昭通的学生们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1月，中共昭通支部建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学生运动上，不断推动革命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昭通，云南省立第二中学（1932年改名为云南省立昭通中学）的师生群情激愤。学校训育主任、乐歌教员潘吾刚迅速召集全校学生聚集于文庙大成殿内，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九一八”事变经过，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恶暴行。在场学生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失声痛哭，义愤填膺。

经师生共同商议，学校决定组织军训，成立决死队、义勇军和童子军，并组建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进行宣传动员。学校教务主任邓子琴亲自撰写《省立二中义勇军大队成立宣言》并印发至社会各界。师生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在辕门口和十字街悲愤地向群众演讲，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事迹，大声疾呼挽救民族危亡。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救国”“驱逐日军”“抵制日货”等标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虽值暑假，但昭通中学仍有部分学生留校。在高12班“秘密读书会”成员的带领下，学生们连夜书写标语口号，天刚亮便上街张贴，宣传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那时，昭通城锣鼓喧天，大街小巷彩旗飘舞，陡街、西街的许多商店纷纷进行商品大减价，全城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昭通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行动，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支柱。她的贡献将被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图片来源：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昭通民众修抗战飞机场。

『九香』洋芋：香飘游子心

通讯员 牛文炬

不知从何时起，我总爱独坐书桌前，翻看学生时代的相册与日记。那些泛黄的照片和潦草的字迹，勾勒出记忆深处最鲜活的家乡印象。其中，其貌不扬的“九香”洋芋最令人难忘，它独特的9种柔和滋味，仿佛被时光封存的乡土记忆，虽历经风霜雨雪，却依然芬芳如初，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在鲁甸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洋芋可谓家喻户晓。冷凉片区的田间地头，阡陌纵横的沟壑间，处处可见洋芋默默生长的身影，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土豆”。它是炖锅里不可或缺的灵魂，那些看似普通的外表下，藏着土地最真实的馈赠。

“九香”洋芋的“九香”，并非指地名或品种，而是我心中的洋芋所蕴含的9种滋味：泥土之香、炊烟之香、母亲之手香、灶火之香、童年之香、节令之香、乡愁之香、坚韧之香、生命之香。这不是植物学的分类，也不是农产品的标准，而是一个游子对故乡最私密的味觉密码，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印记。这9种香气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轻轻一拉，便牵动游子心头最柔软的思念。

鲁甸的四季是洋芋书写的生命史诗。初春时节，洋芋在泥土中悄然苏醒，雨水浸润着萌发的嫩芽。它们不择水土，无需浇灌，在黑暗中默默膨大根茎，把贫瘠化为丰盈。待到春深，洋芋花开如雪，五瓣白花在田间地头绽放，芬芳四溢。微风拂过花丛，洋芋轻轻摇曳，仿佛大地在低语：我已备好你所需的食粮。霜雪初降，田野渐渐空旷。捡柴生火，将洋芋烤至金黄绵软，咬上一口，沙糯甘甜的口感混合着柴火香与泥土气息，令人回味无穷，那是大自然最原始的馈赠。深冬来临，挖窖深藏当年吃不完的洋芋，再盖上稻草，隔绝寒气和冰凌。来年春荒时节，洋芋虽表皮略皱，内里却依旧饱满。一筐洋芋，竟能撑过青黄不接的艰难岁月，默默守护着全家温饱。童年不懂艰辛，只知洋芋苗绿得可爱，花开时美丽动人。待到收获时节，满筐滚圆的洋芋，承载着农人最朴实的喜悦。如今回想起来，才发觉那不仅是农人辛勤劳作的回报，还是他们与土地最亲密的对话。20世纪70年代，洋芋成了“救命粮”。它虽外表平凡，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以沉默的坚韧撑起生命的重量。那特殊的滋味，与饥饿、挣扎、坚持融为一体，刻入人们记忆深处。洋芋不仅是食物，还是土地与人情最朴实的交融。

鲁甸的秋，似乎要来得迟些。可村里的人们已套上老黄牛，扛着犁头、铁锨，提着荆条筐，挎着竹编背篓，穿梭在田间地头——挖洋芋的时节到了。随着犁头翻动，黄皮褐纹的洋芋从泥土中翻滚而出：有的像胖娃娃挤作一团，有的则独自深藏在土坷垃里，需要用手细细摸索。阳光下，它们泛着温润的光泽。人们蹲在地上，麻利地抹去洋芋身上的泥土和须根，然后将大小均匀的洋芋码进筐里。空气中，泥土的气息、汗水的咸味和洋芋的清甜交织在一起，谱写着秋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曲。

“出身卑微”的洋芋，如今却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佳肴：土豆烧牛肉、干煸洋芋丝、韭菜炒洋芋……都是人们的最爱。洋芋不因平凡而黯淡，反而以千变万化的姿态，散发出特有的“九香”。那香气，犹如一缕缕从灶台升起的炊烟，缭绕心间，那是故乡的味道、母亲手掌的温度，也是土地最深沉的爱。洋芋以朴素的芬芳，温暖了每个鲁甸人的童年，滋养着一代代鲁甸人的胃与心。

土墙房：镌刻在时光里的乡村记忆

通讯员 杨长亲

几个月前，笔者进山探寻风土人情。行至一片青翠的稻田边，不经意间，3间被遗弃的老土墙房映入眼帘。走近细看，房屋大门已损毁，屋顶小青瓦零星滑落，墙体却依旧完好。在空旷寂静的半山腰，这处毫无烟火气息的土墙房尽显孤零与沧桑，仿佛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土墙房：先辈的栖居智慧

土墙房，是先辈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孩提时，笔者家中便修建过一间土墙房，用作堆放柴火、农具及草木灰等杂物。所谓土墙，即用泥土夯筑而成的墙体，土墙房便是以其为主体建造的房屋。土墙房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修建土墙房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就地取材，因此建设成本低廉，且具备冬暖夏凉的特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土墙房在农村颇为常见。45年前，笔者曾目睹邻居家修建土墙房。彼时，由于生产力落后、交通不便、物资匮乏，邻居家修建了取材方便、造价低廉的土墙房。

建造：众人齐心的协作之歌

修筑土墙房需10多人密切配合。大师傅肩负重任，负责把控墙板架设、墙体垂直度、墙体转角处内外墙板差值、门窗尺寸及墙顶分水坡面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参数。其他人则分工明确，负责挖土、运土、筑坯、打光面，以及后期的上梁、安檩、钉椽、盖瓦等屋架工作。

负责技术的大师傅会先在平整的地基上，借助弯尺（90度的角尺）、三尺片（1米长的自制竹质尺子，刻有寸长、尺长刻度）、细绳和小木桩等工具进行定点定位，以确定房屋朝向、开间尺寸及大门位置与宽度等，这一工序俗称“放线”。线放好后，便开始架设第一板墙板。一副墙板由可互换使用的内墙板和外墙板组成，长1.5米至2米，高约0.5米。墙体厚度则依据土质和总高度而定，一般在0.3米到0.5米之间。

第一板墙板架设好后，将黏性较好的黄泥巴倒入墙板中，由2—3名年轻力壮者手执木质墙槌，用力将墙板中的黄泥筑紧、夯实，俗称“舂墙”。舂墙是修建土墙房最艰苦的环节，常常需要多人轮流操作。每完成一板，师傅便取下墙板，紧贴已舂筑好的墙体架设下一板。如此循环，完成一圈后便向上舂筑第二层，直至墙体达到预设高度。

为提升墙体的整体连接性和强度，在板与板之间的接头处、墙体转角处等部位，会加入麦秆、稻草或竹篾等，这如同现代建房中铺设钢筋，起到加固作用，是先辈们通过实践摸索总结出的“土经验”。

当墙体舂筑到一定长度或高度后，需对墙体表面进行打磨处理，俗称“打光面”。此工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用黄泥巴填补坑窝和堵塞支撑墙板的横担孔；二是用小木板反复拍打墙面，尤其是板与板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连接处。通过打光面，墙体变得更加平整、光滑、结实，还能进一步提升板与板、上下层之间的黏合度。

墙体完成后，需自然风干一段时间，随后开始盖房。农村人讲究“吉时”上主梁，主梁安放好后，按照间隔尺寸安装檩子，接着在檩子上钉牢或捆扎固定好椽条，最后盖屋面。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盖小青瓦，条件差的则用麦秆、稻草或山茅草盖顶。屋面盖好后，一处崭新的土墙房便大功告成。尽管只是土墙房，但在那个年代，主人家也会激动不已、满心欢喜。

兴衰：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土墙房具有保温性能好、取材方便、生态环保、造价低廉等优点，但也存在强度低、易裂缝、怕雨水、防震抗震等级差等缺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土墙房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盛及衰的过程，最终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土墙房逐渐被砖瓦房、小楼房所取代。21世纪初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是出现了一次大面积消除农村自建土墙房的行动。参与过脱贫攻坚工作的人都知道，在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时，有“四看”顺口溜：“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住房安全性是判定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重要条件之一，用于居住的土墙房基本被认定为不安全住房的，需重建或改造。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贫困户建房补助资金重新修建砖混结构的安全稳定住房，其他困难群众则通过“危房改造”等项目的补助资金进行住房改造。

根据“一户一宅”和“建新拆旧”的政策要求，凡在原有宅基地以外修建住房的，待新房建成后都需拆除原有宅基地上的危房，并将其恢复成耕地。因此，在脱贫攻坚时期，大量农村自建的老土墙房被拆除。如今，只有在边远山区，极少数相对安全且仅用于存放农具、肥料等物资的土墙房得以保留。

传承：土建筑的文化之光

如今，农村自建的老土墙房已成为历史时空中的印记，如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但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受到保护、具有研究价值的“土建筑”并未消失。西北地区的“穴居式”窑洞，便是“以土成墙”的典范。不过，窑洞与南方的土墙房在建筑结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掘土成室，后者垒土为墙。

“穴居式”窑洞不仅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传统民居，还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建筑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延安杨家岭窑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福建省龙岩市的永定客家土楼闻名中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南京明城墙（部分为土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墙，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省会泽县的毛家村土坝，被誉为“亚洲第一土坝”……

记忆中，笔者家那间用于堆放柴火、农具和农家肥的土墙房，历经10余年风霜雪雨，墙体开裂、摇摇欲坠。为保障家人生命安全，父亲毅然将其拆除。每次回到老家，40多年前那间老土墙房的模样总会浮现在眼前。因此，当笔者在高山里、田野边偶然看见那种孤零零的老土墙房时，就像见到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既熟悉又陌生，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怀念和浓浓的乡愁，久久挥之不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土墙房跨越地域与时代，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兴盛于唐朝，延续至20世纪末，最终在21世纪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在水富市的乡村，几乎很难见到有人居住的土墙房。那些曾经低矮、潮湿、简陋的土墙房早已破茧成蝶，变成了一栋栋高大、漂亮、整洁、舒适的小楼房，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广袤乡村的绿水青山间，成为新时代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